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Atul Kohl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引导的发展
——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

[美]阿图尔·科利 著 / 朱天飏 黄琪轩 刘骥 译



CAMBRIDGE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国家引导的发展

——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

[美]阿图尔·科利 著/朱天飏 黄琪轩 刘骥 译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Atul Kohl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1st

(ISBN 0-521-54525-9) by Atul Kohli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Beijing Branch 2007

本书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本书封面贴有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6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 /
(美)科利著；朱天飏，黄琪轩，刘骥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2

(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书名原文：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ISBN 978-7-80720-987-4

I. 国… II. ①科…②朱…③黄…④刘… III. ①国际
政治—研究②工业化—研究—世界 IV. D5 F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3853 号

书 名：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
作 者：科利
译 者：朱天飏 黄琪轩 刘骥
策划编辑：曹海军
责任编辑：杨 洋
装帧设计：SDDoffice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mm × 960mm 1/16
印 张：36.5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20-987-4
定 价：47.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国际编委会

Ha-Joon Chang(剑桥大学经济学院)

Peter Evan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Peter Gourevitch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Stephan Haggar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Peter Hall(哈佛大学政府系)

David C. Kang(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

Peter Katzenstein(康乃尔大学政府系)

Michael Man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

Atul Kohli(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Margaret Levi(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Mathews(麦考瑞大学管理学院)

Joel Migdal(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Gregory Noble(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Ove Pedersen(哥本哈根商学院商业与政治国际中心)

Adam Przeworski(纽约大学政治学系)

Herman M. Schwartz(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

Linda Weiss(悉尼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

Meredith Jung-En Woo(密西根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Zysm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系)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2006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吉林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1965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

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

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即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著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荐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以及杨洋女士的具体联系工作。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

前 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础。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

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视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据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转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实

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作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鸣 谢

这本书用了近 10 年的时间才完成。大部分研究和写作是在 3 次学术休假里完成的。我首先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因为它提供这样慷慨的学术休假制度。这 3 次学术休假的第一次是在 1992 年至 1993 年,当时我是耶鲁大学经济增长研究中心(the Economic Growth Center)的访问学者。我感谢滨田宏一(Koichi Hamada)、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和 T·N. 斯里尼瓦桑(T. N. Srinivasan)(时任中心主任)给与我的支持与同事式的合作。纽约市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为我提供了一整年的研究经费,使我可以从 1996 年至 1997 年不承担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而专门从事研究。最后,我也曾于 2001 年至 2002 年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研究生中心(the Graduate Center)作访问学者。我感谢那一年里福里斯特·科尔伯恩(Forrest Colburn)、毛里奇奥·丰特(Mauricio Font)和苏珊·伍德沃德(Susan Woodward)的友谊和与我的交流。

几位有类似学术兴趣的同事看了整个书稿,并提出了很有用的建议。我想特别感谢托马斯·卡拉菲(Thomas Callaghy)、安德鲁·科尔曼(Andrew Coleman)、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帕特里克·赫勒(Patrick Heller)、阿舒托西·瓦尔希尼(Ashutosh Varshney)和禹贞恩(Meredith Woo-Cumings)的帮助。另有一些同事阅读并评论了部分书稿,使我不必因弄错事实而窘困,而且还修改或澄清了我的论

点。这些学者包括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谢里·伯曼(Sheri Berman)、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凯特·埃克特(Cater Eckert)、尼尔·恩格尔哈特(Neil Englehart)、约翰·耶林(John Gerring)、斯蒂芬·哈格特(Stephan Haggard)、杰夫·赫布斯特(Jeff Herbst)、戴维·康(David Kang)、卡普尔(Devesh Kapur)、约翰·P. 刘易斯(John P. Lewis)、普拉塔普·梅塔(Pratap Mehta)、文正仁(Chung-In Moon)、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亚当·科泽沃斯基(Adam Krzeworski)、苏珊·鲁道夫(Susanne Rudolph)、安娜·希莱尼(Anna Seleny)、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约翰·沃特伯里(John Waterbury)和克劳福德·扬(Crawford Young)。与我普林斯顿大学同事埃文·利伯曼(Evan Lieberman)的讨论对反思一些概念类别尤其有帮助。

我也必须感谢一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的帮助。里娜·阿伽瓦拉(Rina Agarwala)、瓦尼奥·克瑞克胡斯(Vanya Kriekhaus)、埃里克·库浩达(Erik Kuhonta)和拉尼·马伦(Rani Mullen)不仅是有能力的研究助理而且还是对于书稿的不同部分来讲具有学术洞察力的批评者。我想特别指出马娅·图德(Maya Tudor)作为助理和批评者所做的重要贡献,尤其在准备图表以及帮助完成书稿的准备等方面。其他阅读了书稿并提供了书面评论的研究生包括布鲁斯·吉莱(Bruce Giley)、雅伊梅·科兹尼尔-罗贝斯(Jaime Kirzner-Robers)、伊丽莎白·科特瑞尔(Elizabeth Kittrell)、伊兰·纳姆(Ilan Nam)、欧瑟进(Sejin Oh 音译)、戴维·扬(David Yang)和叶敏(Min Ye 音译)。最后,克里·格里芬(Kerry Griffin)帮助完成了本书的索引部分。

伊莲·科恩(Ilene Cohen)很好地编辑了书稿。我对她表示衷心地感谢。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为封面的艺术设计提出了很好的想法。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刘易斯·贝特曼(Lewis Bateman)对本书保持着长时间的兴趣,使我得到了需要的激励。我最要感谢的是埃德娜·劳埃德(Edna Lloyd),她反复打字,提供了多次书稿。虽然无需

多言,但我还是要说:她愉快的合作是这个研究项目能够完成所必不可少的。

最后,我想鸣谢家人的帮助。在这个长时间的研究项目里,玛丽·戈特沙尔克(Marie Gottschalk)和我们的女儿塔拉·科利(Tara Kohli)为我提供了一个平衡生活所需的所有温暖、娱乐和欢呼。我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家庭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我愿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贾伊·德夫·科利(Jai Dev Kohli)博士和普什帕·科利(Pushpa Kohli),感谢他们长久的爱和支持。

导论:全球边缘地区的国家^①与工业化

具有效力的合法政府以及具有活力的工业经济在当今被普遍看作现代民族国家的决定性特征。自从西方国家在几个世纪前发展出此类政治经济体(political economies),那些落后国家就一直在寻求赶超。像日本和俄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late developers)通过巩固自己的国家、采取有别于前的工业化战略逃脱了被殖民化的命运,所以它们的后发展结果各有不同。主要在二战后,随着许多具有活力的新主权国家的崛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此后简称“亚非拉”——译者注)的后后工业化国家(late-late-industrializers)对发展的追求进一步强化。从20世纪末这个有利位置来看,很显然,国家引导的发展(state-led development)在一些边缘地区的努力比在另一些边缘地区更成功。本书探讨国家在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与速度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其在推动有目的的工业化过程中的角色。

在亚非拉的大多数边缘国家里,政府作为一个重要和活跃的经济行为者(economic actor)进行着各种模式的经济干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政府的经济角色与快速工业转型和促进平等联系在一起。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里,情况正好相反,政府与官僚们将自己社会的经济资源窃为己有,不但没有激发经济增长,而且还帮助财富向不事生产的精英(unproductive elites)转移。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干预功

^① 此处的“国家”,即英文里的 state,为国家机构的总称。为防止与国家的一般称谓相混淆,本书内凡是可能产生歧义处,皆以“政府”代之——译者注。

过参半;政府帮助解决了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但与此同时漏掉了另一些经济问题,并且制造了新的问题。

本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内作为经济行为者的政府进行比较性分析。为什么有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能够更成功地促进工业化?这个问题由两部分组成:什么特性使成功案例的国家干预区别于不成功案例?以及如何解释国家选择和执行经济决策的不同能力?【1】第一个问题与国家干预模式相关,它聚焦于国家的政策选择以及国家与其他经济行为者,如商业和劳工集团的关系。与之相对,第二个问题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ies)有关,探讨国家本身的制度特点,而由此体现的国家身份往往在政治精英启动有目的的工业化之前就形成了。因此,本书主要研究以促进工业化为目的的国家构建模式(patterns of state construction)与国家干预模式(patterns of state intervention)。

这主要是一个归纳性的研究,通过细致地分析 20 世纪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见后面的表 1 和图 1)——探寻对政府在发展中国家里作为经济行为者的一种普遍性理解。从较有效力和促进发展的韩国政府到缺乏效力并且腐败的尼日利亚政府,再到巴西、印度两个喜忧参半的例子,这些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国家追求经济转型能力的变化范围。什么因素用来解释变化?这正是后后发展(late-late-development)的关键问题。

基于对这四个案例的比较历史研究(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后开发地区的有效力国家一般创立于工业化经济崛起之前。这是因为以支持投资者获取利润为主旨的国家干预已被证明是工业在后后发展国家崛起和发展的先期条件。国家权威的模式(patterns of state authority),包括国家政治如何组织以及国家权力(state power)如何运用,对私营经济决策所需的经济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国家权威的模式对于理解工业化的不同速度和模式至关重要。国家权威的模式则体现出一种长期延续性。20 世纪前半期的殖民主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国家机构则在 20 世纪后半期塑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

一、需要澄清的事项

如果本研究的焦点不需要从正当性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话,对一些事项至少需要做初步的澄清。以下是三个需要澄清的事项。

首先,很显然,发展的范围远大于经济增长,而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也不仅仅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工业增长的根本差异。另外,任何工业化中有关国家角色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农业增长问题和所得分配问题。然而,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决定工业化的政治与政策因素,因为工业增长是任何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而经济增长则一直是理解发展问题的核心元素。

其次,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的中心思考并不真的需要从正当性的角度进行解释。政府在中国是重要的经济行为者这一命题并不是一个特殊见解。虽然经济增长率反映出多种因素的作用,国家的因素仍然值得在学术上进行严肃探讨。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在一定的时间内影响国家经济运作的变量多种多样,包括世界经济条件、资源禀赋、不同的发展起点、人口因素、国家价格制度、储蓄模式、技术水平,以及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研究经济过程的史学家就从他们角度反复聚焦于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政府的角色。例如,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eynolds)在他有关“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研究的结论部分有这样的观察:对重要经济因素的分析并不能全部揭示出“持续增长源泉”的“秘密”。他认为,经济模型不能考虑到的因素“可以被命名为政治因素。政府是起作用的。”^①时任美国经济学会(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的W·亚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学会发言中曾说过类似的话:对“增长引擎”的任何全面理解都离不开一个基础,即“一个有关政府的理论,其中政府既是问题之源

^① 见 Lloyd G. Reynold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ird World, 1850—198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13-414。

又是解决问题之方。”^①最近更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具有活力的国家是快速发展的要素,特别是在东亚一些地区的发展中,相反,无法正常运转的国家则对失败的发展负有主要责任,比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②因此从初步印象来看,广泛聚焦于国家与发展具有很强的根据。【3】

最后,还有一个有关案例选择的问题,即为什么要选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③暂时有两个简单和初步的根据。第一、这四个国家都是大且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巴西也是人口最多的南美国家(见表1)。^④任何与国家 and 经济发

① W. Arthur Lewis,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 (March 1984): 8.

② 见,例如,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tephe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Developing Countr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Alice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最近的一个对“发展型国家”文献的评论是 Meredith Woo-Cumings, *The Development Stat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有关非洲案例中国家的角色问题,见 Richard Sandbrook, *Politics of Africa's Economic Stag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有关经济学家对机构,包括公共机构,在经济增长中角色的重点探讨可见最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 Dani Rodrik, ed., *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这本书是在本书即将出版时才被我注意到。

③ 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写很多,随着本书的展开我还会回到一些相关问题上,特别是在结论章。表1总结了这四个案例的一些基本发展数据。

④ 如果以“大”和“重要”为标准,其他候选案例还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埃及和墨西哥。中国因其共产主义过去可以被看作一个“圆外点”案例,但中国案例的重要性在于国家能力的讨论,我将在结论章对其进行简单讨论。埃及介入地区斗争太深,因此不是一个典型案例。但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墨西哥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没有被包含在本书的理由是我有限的学术能量。一个涵盖部分本书主题但以墨西哥、埃及、土耳其和印度为案例的比较研究看来有用: John Waterbury, *Expected to Innumerable Delusion: Public Enterprise and State Power in Egypt, India, Mexico, and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